

流动儿童义务教育融入的运行方式困境与社会工作回应

任明粉

北京建筑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3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0日

摘 要

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融入困境, 其实质就是政策运行方式环节上的困境。文章以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2025年对776个流动儿童家庭的调研数据和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 用社会排斥理论的分析视角, 把流动儿童在入学资格获取过程中遇到的排斥现象分解成制度排斥、经济排斥和文化排斥这三个方面。制度排斥表现为身份资格、排序优先规则, 把流动儿童排除在制度之外, 经济排斥表现为空间分配、时序衔接规则, 用住房门槛、刚性时间窗口制造教育机会的断裂, 文化排斥表现为评价文化规则, 隐性课程与文化资本的差别会把流动儿童当作“外来者”。三重排斥层层递进构成排斥闭环, 其原因有地方政府财政权衡、户籍本位的资源分配惯性、流动家庭的结构弱势这三个方面。社会工作专业价值就在于打破这种困境, 在政策咨询、资源链接、社区营造、政策倡导等方面做出具体的回应, 使流动儿童能够融入到当地教育体系中。

关键词

流动儿童, 教育融入, 社会排斥, 社会工作

Challenges in Implement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for Migrant Children and Social Work Responses

Mingfen Re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Beijing

Received: June 26, 2026; accepted: July 31, 2026; published: August 10, 2026

Abstract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migrant children in integrating into compulsory education fundamentally

stem from systemic flaw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s. Drawing on survey data from 776 migrant child households collected by the Beijing Collaborative Social Work Development Center in 2025 and Seventh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statistics, this study employs social exclusion theory to categorize the barriers encountered by migrant children during school enrollment into three dimensions: institutional exclusion, economic exclusion, and cultural exclusion. Institutional exclusion manifests through identity-based eligibility criteria and hierarchical prioritization systems that exclude migrant children from formal educational channels; economic exclusion is reflected in spatial allocation policies and rigid temporal constraints that create gaps in educational access due to housing thresholds and fixed enrollment windows; cultural exclusion arises from evaluation frameworks that marginalize migrant children as “outsiders” due to disparities between their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mainstream educational norms. These three layers of exclusion form a self-reinforcing cycle, rooted in three key factors: fiscal considerations by local governments, entrenched household registration-based resource distribution practices, and structural vulnerabilities faced by migrant families. The core value of social work lies in addressing these challenges through targeted interventions—including policy consultation, resource coordination, 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advocacy efforts—to facilitat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into local education systems.

Keywords

Migrant Children, Educational Integration, Social Exclusion, Social Work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问题的提出

我国正处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期。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知，全国流动儿童规模为 7109 万人，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有 1.38 亿人，占全国儿童总人口的 46.4%。这就意味着，近一半的中国儿童的成长受到人口流动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抽样调查发现有 56.8% 的流动儿童是“城里娃”，他们出生在城市或者在城市度过了半数以上的时间，很多孩子对户籍所在地乡镇的名字一无所知，所谓的老家只是外界给的标签[1]。流动正在向定居转变，公共政策和社会服务也应该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融入，使他们的融入不再因为各种排斥而悬空。国家不断健全流动儿童教育保障政策，2024 年民政部等 21 部门印发了第一个专门针对流动儿童的综合性政策文件《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在教育方面做出相应的说明[2]；《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的要求[3]。政策供给力度不断加大，政策支持不断健全，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也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重视[4]，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达到了 97.0%，但是政策的“数量指标”和儿童的“实质体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5]。协作者 2025 年对 776 个流动儿童家庭进行调研发现，70.54% 的家长在办理子女入学时遇到困难，40.08% 因为户籍原因不能在流入地升学，65.44% 的流动儿童没有得到课后学业辅导，43.03% 的儿童因为搬家而失去了好朋友而感到孤单[6]。数据显示流动儿童虽然进入了学校，但是并没有真正地融入到学校当中去。

为什么政策不断改进但困境依然严重呢？本文认为问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政策是否存在问题，而在于规则如何确定、政策怎样运行身份资格和排序优先规则、空间分配与时序衔接规则、评价文化规则等具体运行方式才是对流动儿童系统性排斥的来源。本文用社会排斥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入学资格各个

环节的排斥现象进行系统的分析，探究社会工作介入的方式方法。

2. 已有研究梳理

针对流动儿童义务教育融入问题，学术界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以下从政策演进、融入困境、成因解释三个方面梳理已有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指出研究缺口。

2.1. 政策演进：从“排斥”到“包容”的制度变迁

流动儿童教育政策是从排斥到包容的过程。王鹏程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法，把政策变迁分成三个时期，即 1990 年代政策试点期、2001 年“两为主”原则确立期、2014 年“两纳入”深化期，认为地方政府对于户籍制度的主动依赖产生了政策执行路径依赖[7]。方媛、姚佳胜对“两为主”到“两纳入”再到“两统一”的政策脉络进行了梳理，并指出政策的价值取向也由原来的以效率为先变为以人为本[8]。张眉、宋映泉从财政史的角度认为经费保障的制度化程度是决定政策效果的重要变量[9]。就制度文本而言，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制度。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已达 97.0%，但是“数量指标”下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招生顺位中房产一致为第一顺位，流动儿童一般被列为租房加居住证的第五顺位，实际上是对流动儿童的入学降级[10]。不断完善的政策文本不能满足流动儿童的教育获得感。

2.2. 融入困境：从“入学机会”到“发展预期”的多方受限

流动儿童的融入困境不单表现在能否入学上，也渗透在教育过程和发展的预期里。入学机会上，在对北京市的调查中发现，“两为主”政策背景下的流动儿童家长仍然存在择校行为，说明公办学校质量对于流动家庭的影响[11]；教育过程上，协作者报告中提到 65.44%的流动儿童没有接受课后学业辅导，61.60%的儿童从未得到社区专项服务，43.03%的儿童因为搬家而失去了好朋友并感到孤单。曾守锤认为流动儿童在学习适应、师生关系等方面明显低于本地儿童[12]；发展预期上，流动儿童接受流入地普通高中教育仍有困难，普通高中就学问题始于“异地中考”问题的解决。依托官方教育统计数据可知，小学在读流动儿童有 903.81 万人，进入初中就读的流动儿童有 405.02 万人，从小学到初中的流失比例达到 55% [13]。流动儿童不但会遭遇制度上的障碍，还会陷入到身份认同的危机之中，“进了校门”并不意味着就“融入了学校”[14]。可见流动儿童的融入困境从入学择校的隐形筛选、校园生活的体验断裂、升学通道的制度收窄三个方面来体现，虽然进了学校但是融不进学校。

2.3. 成因解释：制度、政策执行与社会排斥的多重视角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融入困境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制度视角把户籍制度和教育财政体制的根源性障碍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人均公用经费随学生流动可以携带使流动儿童的随迁概率上升，但是中央补助覆盖面小、力度不够[15]。作者的数据直接说明了公办就读率和家庭入学率之间存在着矛盾。把家庭视角纳入到公共政策的分析中来，政策的设计要考虑到流动家庭整体的需求和决策逻辑[16]；社会排斥视角给多重困境的解释赋予了整合性的框架。社会排斥的概念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法国，最初的定义是那些被排除在社会保险体系之外的人群[17]。我国较早地提出了制度排斥、经济排斥、文化排斥这三个维度的分析模型，认为流动儿童在教育机会、教育过程、教育结果这三个方面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18]。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角度出发，认为流动儿童教育问题表现在学校教育公平缺失、家庭教育严重缺失、社区教育不到位、社会融入困难这四个方面的内容上，各个方面互相影响，造成困境的循环累积[19]。本文参照制度排斥、经济排斥、文化排斥这三个主要方面，从这三个方面来剖析流动儿童教育政策运行时存在的排斥现象及其原因，这一三维框架在教育排斥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4. 研究缺口与本文的分析框架

已有研究在以下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在政策层面整理出制度变迁的脉络,实证层面发现多维融入的困境,理论层面建构起多元成因的解释。但是还存在着两个明显的不足,一个是宏观政策分析和微观融入体验之间缺少分析的桥梁。政策怎样经由具体规则运转成个体的排斥感受,这个过程机制还不清楚;二是虽然有关研究涉及了社会工作的介入途径,但是大多只是停留在一般性的“服务供给”层面,并没有明确地回答社会工作对于这种特定机制的回应方式。根据以上缺口,本文以社会排斥理论为分析框架,从入学资格获取入手,对流动儿童所遭遇的排斥机制进行系统的分析,进而探究社会工作对于规则运行各个环节的回应策略。

2.5. 数据来源

2.5.1. 数据来源概况

本文数据来源有两个渠道。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2025 年调查数据。本次调研主要针对流动儿童及其家庭在城市生活中的需求和问题展开研究,使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在北京市朝阳区、海淀区、昌平区三个流动人口较多的区域进行数据收集。问卷内容包含流动儿童家庭基本信息、入学经历回溯、政策认知和信息获取、学校适应和心理健康等几个方面。共收回问卷 776 份,完成深度访谈 53 例,分为家长访谈 32 例、儿童访谈 12 例、教师及社区工作人员访谈 9 例。访谈录音经过逐字转录之后就变成了大约 18 万字的文本资料。第二部分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得到全国及各省流动儿童数量、分布状况、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数等宏观背景信息,用以做比较、结论推断的参照标准。

2.5.2. 抽样方法与样本特征

协作者调研数据采用分层立意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法。第一阶段根据流动人口的区域分布特点,把北京市分成城六区和近郊区两个层次,在朝阳区、海淀区、昌平区各选择 2 到 3 个流动人口聚集的社区作为初级抽样单元,以覆盖从事制造业、批发零售、家政服务、个体经营、新业态等不同职业类型的流动家庭。第二阶段用社区儿童之家、城中村房东、小型私营企业主等关键信息人作为初始接触者,用已参与家庭推荐其他符合条件的流动家庭,逐渐扩大样本。最终分析得到的 776 个有效样本中,儿童学段为小学的占 71.3%,为初中阶段的占 28.7%,从来京时长来看,5 年以上的占 33.8%,3~5 年的占 28.9%,1~3 年的占 27.1%,不足 1 年的占 10.2%;从家长职业来看,批发零售和餐饮服务业占 29.8%,制造业和建筑业占 19.1%,家政和保洁占 14.5%,新业态劳动者占 17.5%,个体经营占 10.2%,其他占 8.9%。

样本代表性讨论,本研究的样本在职业分布、收入结构、居住类型等各方面与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宏观统计特征比较接近,说明样本比较符合北京市流动儿童家庭的主体构成。也有局限性,样本只来自于北京市三个区,没有包括长三角、珠三角等主要流入地,因此结论在向其他城市推广时需要结合当地的政策和资源条件做适当调整;样本主要来自城市近郊区和城乡结合部,对居住在城市中心城区或者远郊农村的流动儿童,他们的入学障碍的具体表现可能会有所不同;样本中家庭月收入 3000 元以下的极端贫困家庭占比约 11%,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覆盖,但是对于完全未进入任何公办或民办学校、处于失学状态的更边缘群体,本研究数据可能存在遗漏。因此本研究的分析对象主要是已经申请入学或者已经入学的流动儿童,对于完全脱离教育系统的人群,其机制需要专门的研究。

3. 社会排斥视角下的入学资格规则分析

流动儿童义务教育融入的困境,本质上是政策在运行方式上“入学资格”在三个维度上的排斥性。

分别从制度排斥、经济排斥、文化排斥三个维度进行相应入学资格规则的运作机制及其排斥的分析，三重排斥并非彼此独立，而是沿着流动儿童的教育融入过程形成了一条层层递进的排斥链，前面的排斥筛选掉一部分人或降级一部分人，后面的排斥则在既有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隔离与边缘化。具体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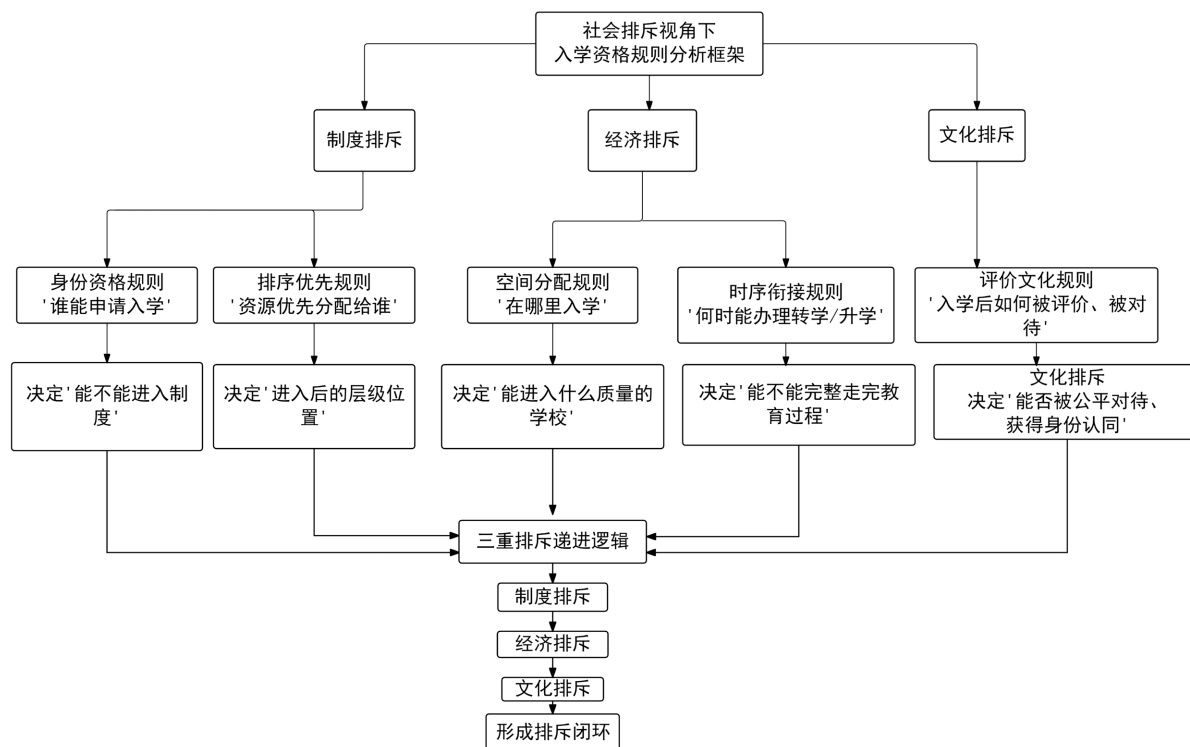


Figure 1.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admission eligibility ru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xclusion

图 1. 社会排斥视角下入学资格规则分析框架

3.1. 制度排斥：身份资格与排序优先规则

制度排斥是流动儿童入学面临的最直接、最显性的排斥现象。它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身份资格规则主要体现在“谁有资格申请入学”的准入问题；二是排序优先规则主要是“在资源有限时优先分配给谁”的排序问题。二者同属制度排斥，但运作逻辑不同，前者筛选“能否进入制度”，后者决定“进入制度后的层级位置”。

3.1.1. 身份资格规则：制度准入与隐形约束的双重门槛

当前各地义务教育入学普遍实行以居住证为核心的“材料准入制”或“积分入学制”。表面上看政策已“放开”，但实际操作中，流动儿童家庭面临高企的资格门槛。协作者报告显示，70.54%的家长在办理子女入学时遭遇困难。这种排斥通过两种机制运作。一是社保缴纳门槛。多数城市要求父母连续缴纳社保一定年限如 6 个月、1 年甚至更长方可申请入学。但协作者报告显示，流动儿童家长从事的职业以制造业普工、商贩、打零工、保洁家政等劳动强度大、技术门槛低的岗位为主，17.53%属于新业态劳动者如骑手、快递员、分拣员等，工作稳定性低，社保缴纳有一定的困难。二是居住证办理困境。流动家庭以租房为主，办理居住证需要房东配合提供房产证明。但报告指出，“部分流动人口因租住的房屋没有产权证明或者房东不配合而无法办理居住证”。一位流动儿童家长在访谈中反映：“房东怕我们要办居

住证后就不搬走了，又说要交税，死活不肯提供房产证。我加了两个月租金，说了无数好话，才勉强拿到复印件。”身份资格规则的排斥性在于政策文本承诺了“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入学权利，但社保年限、房东配合等条件成了流动人口难以逾越的隐性壁垒。流动人口在形式上享有入学权利，但在实质上无法满足规则设定的附加条件而被排斥在外。这是一种“规则形式上的包容”与“执行实质上的排斥”悖论。

3.1.2. 排序优先规则：房户一致的招生顺位

“入学难”不仅指无学可上，更体现为优质教育资源的不可及。各地普遍实行“房户一致”优先的招生顺位制度，流动儿童通常处于“租房加居住证”的第五顺位，随时面临被调剂的风险。有教育工作者坦言，热点学校学位优先满足更高顺位学生，随迁子女进入重点名校的机会有限；一位租住在学校附近的家长反映，尽管提前备齐材料且住处距 L 小学步行仅 10 分钟，却在 7 月底被调剂至需骑行 25 分钟的 B 小学。排序优先规则的本质，是将户籍与房产这两项流动家庭最匮乏的资源作为分配优质教育机会的核心标准，流动儿童即便通过身份资格审核，也只能获得剩余学位。地方政府对户籍制度的主动依赖形成了政策运行中的路径依赖，排序规则正是这一路径依赖在操作层面的具体体现。

3.2. 经济排斥：空间分配与时序衔接规则

如果说制度排斥决定了“能否进入”和“进入哪一层级”，那么经济排斥则通过市场机制和资源配置规则，决定“能进入什么质量的学校”和“能不能完整地走完教育过程”将流动儿童进一步隔离在弱势的教育处境中。它体现在两个层面，空间分配规则，通过住房市场的经济门槛将低收入家庭隔离于优质学区之外；时序衔接规则，通过学籍管理的时间限制将流动家庭的经济不稳定性转化为教育过程的断裂。

3.2.1. 空间分配规则：经济能力的地理投射

我国义务教育实行“就近入学”原则，但这一原则与“居住地”绑定，而居住地本身受制于住房市场的经济门槛。公立学校学区划分以实际居住地为准，但是流动家庭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大多集中于房租便宜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或者工业区周边，这些地方常常对应着教育资源配置较弱的学校，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设施简陋、课外活动匮乏。协作者报告指出，58.96%的流动儿童家长学历在初中及以下，32.35%的家庭存在收支失衡的问题。他们不能通过选择好的居住地来获得好的学区入学资格。小学阶段流动儿童在校生 903.81 万人，初中阶段 405.02 万人，从小学到初中流失比例高达 55%，大量流动儿童在义务教育中后期被迫返回户籍地，经济压力是最主要的原因。空间分配规则表面上“一视同仁”无论户籍，只要住在某学区即可入学，但居住市场的经济门槛使不同收入群体被系统性地分配到不同质量的学区。这属于一种“去制度化的”经济排斥。排斥机制不是直接以制度条文的形式存在，而是依靠市场机制把经济弱势群体留在低质量教育资源里。

3.2.2. 时序衔接规则：经济不稳定的制度后果

国内绝大多数地区仅在秋季集中办理入学与学籍转接手续，而外来务工人员面临劳动合同终止、工程竣工、企业迁址等难以预判的就业变动，大量转学申请无法及时处理。协作者调研显示，40.08%的流动儿童因户籍政策约束在升学关键节点被迫返乡，异地高考考生在全国占比仅约 3%左右。一位从安徽来沪的家长反映，若在上海读完初中再回乡考试，两地教材与考点差异反而耽误孩子，只能提前送回老家适应。尽管 77.06%的家长与 63.41%的儿童期望长期定居城市，现行制度的时间刚性却使这一期盼难以实现。这种不确定性本质上是流动人口收入缺乏保障的体现，其工作稳定性弱于本地常住人口，难以按部就班安排子女的求学节奏，致使制度的时间节点要求与实际生活节律之间持续错位。从经济收入不稳定，到日常生活节奏频繁变动，最终造成孩子学籍接续出现断层，这一条完整的逻辑链条，直观展现出经济

层面的弱势，是怎样借助制度壁垒，最终演变为随迁子女面临的教育不公问题。

3.2.3. 文化排斥：评价文化规则

文化排斥在三重排斥中最为隐蔽，也最易被教育公平讨论所忽视。它不体现为正式政策条文，而是嵌入日常教学、同伴互动与学校文化之中，通过隐性的评价文化规则运作。协作者报告显示，80.65%的流动儿童家长无法有效辅导功课，约半数儿童认为父母难以提供学业支持；约四分之一对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缺乏认知，61.60%从未获得社区专项服务。上述现实使流动儿童在文化积累上处于劣势，难以回应优质学校中隐含的对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无形要求，在学业评价体系中天然不利。在同伴交往层面，城乡文化差异、方言障碍或生活经验不同亦可能成为被孤立的原因，43.03%的儿童因搬家失去好友而感到孤单。文化排斥的隐蔽性在于它以“公平竞争”和“统一标准”为名，不公开拒绝任何人，却使部分群体在日常实践中持续处于不利地位。这种文化身份的贬低过程，是文化排斥最深刻的伤害它不仅限制了流动儿童的教育成就，更动摇了他们的自我认同和社会归属感。

4. 三重排斥的深层成因：多主体互动与循环强化机制

三重排斥不是三个独立的维度，而是沿着流动儿童教育融入的时间轴依次展开、层层递进的一条排斥链，制度排斥在前端筛选出可以进入的群体，经济排斥在中端决定进入什么样的环境，文化排斥在后端影响进入之后如何被对待。三重排斥之间存在着一种循环强化的关系，经济弱势使得制度门槛的实际高度被经济弱势所加深，制度排斥造成的流动性受限又加重了家庭的经济不稳定性，文化排斥造成的标签效应又进一步削弱了流动家庭应对前两种排斥的心理资源和社会资本。三者之间不是简单的“A 导致 B，B 导致 C”这种线性链条，而是一个互相因果、自我再生产出来的闭环系统。闭环的形成和保持是由多重行动者在一定的制度环境里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4.1.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目标分化与执行张力

中央政府政策目标是教育公平和人口流动自由，其政策文本也不断向包容方向转变。但是地方政府处在多重约束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分税制财政体制之下，地方政府必须在本级财政收支平衡的硬性约束之下承担义务教育供给的责任。接纳流动儿童入学会直接增加教育支出，但是流动人口带来的人才和税收红利具有长期性和外溢性，培养出来的劳动力可能会流向其他地区。该成本与收益的时间、空间错位，使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的时候出现选择性落实的激励。中央政府追求公平目标和地方政府追求财政平衡目标之间存在着张力，从而给制度排斥、经济排斥、文化排斥的产生创造了结构上的空间。

4.2. 地方政府与学校：资源约束下的变通执行

学校处在政策执行的末端，有三个压力，即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考核要求、有限的教育资源、家长的差异化期望。在优质学位供不应求的常态之下，学校一般会以“程序合规”作为行为准则，严格按照招生顺位来录取学生，从而减少争议，降低管理成本。一位受访者认为，我们完全按照区里规定的顺序来进行，前面的顺位满了就是满了，后面的顺位的材料再好也没有用，这并不是学校所能决定的。学校“程序主义”的行为表面上是合法的，实际上把制度排斥成儿童具体遭遇的屏障。

4.3. 学校与家庭：隐性筛选与被动适应

在学校和家庭之间，文化排斥在日常教育实践中被生产、被再生产出来。城市公立学校普遍采用以城市中产阶层文化规范为标准的评价体系，课堂参与方式、课外阅读要求、家长配合程度等非正式指标，实际上就是一套隐性的筛选机制。流动家庭由于文化资本缺乏、务工时间紧张，很难达到这些隐性的标

准，其子女在学校评价体系中自然处于不利的地位。同时流动家庭对于政策的认识和应对能力比较低，而且长期受到排斥所造成的不信任感会使得他们对于制度上的障碍采取被动接受或者消极应对的方式，而不是主动地提出申诉或者申请政策救济。被动的姿态又加深了学校对于流动家庭“不重视教育”的刻板印象，造成学校和家庭之间认知的负循环。

5. 社会工作的回应：打破“运行困境”

5.1. 破解制度排斥：打通信息渠道，实施精准帮扶

制度排斥体现在流动家庭无法理解或满足资格审核的烦琐要求。社会工作的首要回应是提供精准的政策咨询服务，帮助流动家庭跨越身份资格与排序优先的规则障碍。具体而言，社工可通过以下方式展开介入，一是提供“一站式”教育政策咨询。帮助流动家庭解读入学政策、梳理材料清单进行信息赋能。协作者报告建议“培育流动儿童服务组织，对流动儿童家庭提供‘一站式’教育政策咨询，建立线上咨询渠道”；二是针对个案提供精准协助。例如，针对房东不配合导致无法办理居住证的问题，社工可协调社区开具居住证明或推动政策层面的替代方案。针对信息匮乏导致的入学材料不齐全，社工可主动上门提供政策信息并协助办理；三是建立流动儿童家庭需求档案，社区工作者应动态掌握辖区内流动儿童的家庭情况，建立需求档案，对特殊困难儿童实现从普惠性服务到精准化帮扶的全覆盖。

5.2. 缓解经济排斥：整合外部资源，筑牢社区保障

经济排斥在空间分配上、时序衔接上体现出来，社会工作回应的是外部资源、社区保障的缺失。从空间分布来看，社工可以促使社区层面教育补偿的实现。社工可以充当资源链接者，在流动人口聚集的社区建立儿童服务中心、课后托管点。广州“火把社区”、“美团袋鼠宝贝之家”实践表明，社区来承担照顾孩子的工作，可以大大减轻妈妈们的负担。重庆北碚区亲子工作坊项目共举办活动120场，服务2400多户低龄流动儿童家庭，用感统游戏、本地文化研学、家长课堂等方式帮助流动儿童适应新的环境，在时间上可以给即将转学或者升学的流动儿童提供过渡的支持。这就需要流动家庭去了解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教材不同、考试要求也不同，从而避免出现第二次留守的无奈之举。给返乡儿童提供适应性支持，减少由于教育过程断裂而造成的社会关系破裂。

5.3. 化解文化排斥：促进社区共融，构建身份认同

文化排斥主要是流动儿童学业评价处于劣势、不能交到朋友、容易产生自我身份困惑，社会工作可以深耕社区建设来帮助孩子建立稳定的身份认同。社工借助小组工作搭建起本地儿童和流动儿童之间的交流互动的平台，促使孩子发挥自己的特长，在集体生活中找到自身的存在感、归属感。此类活动目的在于改变固有的认知，把外来孩子的文化差异从短板变成优势，打破文化排斥的固有认知；学业帮扶上，社工组织志愿者开展课业辅导，弥补流动家庭文化资源匮乏造成的学业差距。社会组织调查也提出可以招募志愿者为孩子补课，使孩子顺利度过转学后的学习适应期。除此之外，社工在服务过程中还要引导流动儿童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使他们认识到自己身上自带的乡土文化并不是落后，只是多元文化中的一种类型；面向家长开设家长成长小组，提高流动人口家庭教育能力。许多家长不能辅导孩子学习，并不是因为疏于管教，而是缺少教育知识和科学的方法。社工介入使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家长成了孩子抵抗文化的盾牌，于是文化排斥就在家庭里一代传一代。

5.4. 综合治理三重排斥：立足实务服务，推动政策优化

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提供直接服务，更在于将基层真实情况转化为政策建议。相关调研指

出，应推动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入学政策，简化入学材料、推行一证入学，优化异地升学制度，增加公办学位供给，并将流动儿童教育服务纳入学校考核。社会工作在政策推动中具有独特优势，能够依托一线服务，真实反映政策执行中的障碍，发现哪些规定在实际运行中形成隐性排斥、哪些措施因操作问题难以落实。这种自下而上的反馈，有助于缩小政策设计与实际落地之间的差距。同时，社会工作应推动将家庭视角纳入政策制定，让流动儿童家庭的真实需求被有效听见和吸纳。

5.5. 社会工作的能力边界与介入策略优化

社会工作在回应流动儿童义务教育融入困境中具有独特价值，但也面临明确的边界。正视这些边界，有助于制定更为务实的介入策略。

5.5.1. 社会工作的主要挑战与伦理困境

社会工作对流动儿童的教育排斥问题回应的时候，会遇到很多能力边界和伦理困境。其一，个案服务同制度刚性之间的矛盾，社工可以对单个家庭给予咨询和材料上的帮助，但是当排斥的原因是制度本身的设计时，个案解决只能绕道而行，不能消除障碍，制度不变则补救工作永无休止，个案工作同制度改变的脱节是最大的能力边界。第二，资源链接的可持续性困境，目前服务大多依靠 1 到 2 年的项目制运作，资金来源主要是基金会或者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结束之后服务就结束了，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需要重新建立，项目化运作的短期性和问题根深蒂固的长期性之间的矛盾使得介入的效果很难持续。第三，在政策倡导中存在着伦理上的两难选择，在一线积累的排斥案例可以增强倡导的说服力，但是个案公开容易造成隐私泄露、标签化等问题，如何在保护服务对象权益和推动制度变革之间找到平衡点就成为了一个需要认真面对的伦理问题。其四，专业性被行政化吸纳的风险，在政府购买服务框架之下，社工机构既是服务提供者又是政策批评者，当经费主要来自地方政府的时候，批评力度就会受到限制，部分社工认为报告中的措辞要考虑到项目续签的问题，从而影响到政策倡导的深度和锐度。

5.5.2. 从项目化运作走向体系化服务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社会工作应该从三个方面来推进服务的系统化。首先，推进服务制度化嵌入，把流动儿童服务列入社区公共服务标配目录，确定服务内容、人员配备和经费来源，参照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在流动人口集中居住地设立财政保障的儿童社工专岗，由社工机构开展专业运作。其次，创建服务转介和衔接机制，改变目前学校社工管校内适应、社区社工管课后托管、社工机构管政策咨询的碎片化格局，创建以儿童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转介网络，让流动家庭一次求助就能被引导到合适的端口。第三，创建跨专业合作网络，同法律援助机构达成稳定的合作关系，给遭遇制度排斥的家庭赋予申诉代理和公益诉讼支援，把个案争议变成制度改良的机会，同媒体维持长期合作关系，依靠持续跟踪报道形成常态化的舆论监督，同企业合作创建流动儿童教育支持基金和灵活请假制度，从用工端减轻流动家庭办理入学手续的时间冲突，进而形成多层次、可持续的政策倡导合力。

6. 结论

流动儿童城市学校融入困境不是因为政策空白造成的，而是一种由于公共服务分配规则而产生的制度性排斥。本文以社会排斥理论为分析框架，将流动儿童入学资格各个环节的排斥分为制度排斥、经济排斥、文化排斥三重排斥层层递进形成完整的排斥闭环。本文分析认为 7109 万流动儿童虽然生活在城市里，但是却处在不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中。97% 的公办就读率和 70.54% 的家庭入学困难共存，政策条文保证平等，但落实过程中渐渐被忽略。造成三重排斥的深层原因有地方财政收支考虑、依附户籍分配公共资源的固有模式、流动家庭在流入地的双重弱势。社会工作独有的优势就是跳出冰冷的政策条文，关

注服务对象本身，在制度漏洞中找到现实难题，在已有的规则下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对制度排斥社工开展信息普及和精准帮扶；对经济排斥社工整合社会资源、搭建社区保障；对文化排斥社工推进社区共融，帮助儿童建立自我身份认同；面对环环相扣的系统性排斥，社工从一线实务出发，向上级提出政策建议。

但是社会工作的力量是有限的。三重排斥的根本解决要从三个方面一起推进，制度上把入学资格由身份本位变为常住地本位，经济上创建同人口流动相适应的经费保障体系，文化上促使学校评价体系向多元文化包容转变。只有三者齐备，教育公平才从数字走向现实。

参考文献

- [1] 段成荣. 我国流动和留守儿童的几个基本问题[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2(1): 46-50.
- [2] 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9/content_6972120.htm, 2024-08-16.
- [3] 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605/content_7069960.htm, 2026-05-22.
- [4]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5-11/28/content_10357.htm, 2015-11-28.
- [5] 2024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统计监测报告[EB/OL].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12/t20251230_1962182.html, 2025-12-30.
- [6]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看见流动的童年——流动儿童及其家庭需求研究报告(2025) [R]. 北京: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2026.
- [7] 王鹏程.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我国流动儿童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制度变迁与发展[J]. 深圳社会科学, 2024, 7(6): 117-126.
- [8] 方媛, 姚佳胜. 我国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变迁逻辑及未来展望[J]. 当代教育科学, 2020(1): 58-64.
- [9] 张眉, 宋映泉. 中国流动儿童教育财政政策的历史、特点与挑战[C]//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中国教育财政二十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
- [10] 王华英. S市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教育政策执行问题及对策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石家庄: 河北科技大学, 2025.
- [11] 王东. “两为主”政策背景下流动儿童家长“择校”行为分析——基于对北京市的相关调查[J]. 教育发展研究, 2010, 30(12): 82-85.
- [12] 曾守锤. 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的实证研究[J]. 青少年研究, 2012, 24(3): 1-6.
- [13] 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506/t20250611_1193760.html, 2025-06-11.
- [14] 唐榕芳, 周佳. 流动儿童融入城市学校的多重阻滞与实践进路[J]. 教学与管理, 2026(3): 54-58.
- [15] 张明昂, 刘亚卫, 肖鹏. 教育经费配置、流入地义务教育供给与儿童随迁[J]. 经济研究, 2025, 60(9): 239-260.
- [16] 徐晓新, 张秀兰. 将家庭视角纳入公共政策——基于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政策演进的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6): 151-169.
- [17] Room, G. (1995) *Beyond the Threshold: The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Social Exclusion*. Policy Press.
- [18] 冯帮. 社会排斥与流动儿童的教育公平[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 [19] 贺缙莉, 苗春风. 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下城市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研究[J]. 教育评论, 2023(5): 68-76.